

报国

书生

李金强 著

——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

SHIJI SHIJI BAO GUO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目 录

序 书生报国：从富强到民主与科学	周策纵 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自序	(4)
----------	-----

海防论

林则徐与海防建设——以虎门要塞为个案之考查	(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变法论

王韬与基督教	(27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香港华人与中国——何启、胡礼垣个案之研究	(4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胡礼垣与戊戌维新	(5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基督教改革者——黄乃裳与清季改革运动	(8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海权论

严复与清季海军现代化	(10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清季十年关于海军重建之筹议 (1901~1911)	(12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革命论

孙中山之早期思想——农业改良言论探讨 (1887~1895)	(145)
---	-------

附录

当代香港华文史学之兴起——以罗香林 (1906~1978) 为个案	(165)
--	-------

传承与开拓——1949年后台湾之中国近代史研究	(17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征引书目	(215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序 书生报国：从富强到民主与科学

李金强教授把他多年来发表的论文，归纳成“海防”“变法”、“海权”和“革命”四部分，从讨论林则徐、严复，到王韬、何启、胡礼垣、黄乃裳，到孙文等共8篇，汇集成书，要我写一篇序。我读了他的论文，觉得每篇都引证详实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全书对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变革思想史研究大有帮助。

“书生救国”的观念，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士大夫间便逐渐流行，20世纪上半期更为兴盛。试看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傅斯年等召集学者丁文江、胡适、蒋廷黻、李济、陶希圣许多人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开会，傅便提出“书生何以报国？”要大家讨论。可见这个主题十分受人重视。

我以前曾说：现代中国的改革思想都是由外来力量所引发。金强此书也可作证。林则徐本来只受过传统教育，可是他的工作是要应付英、法等国的经济 and 军事侵略，所以逼得非要去加强海防不可。至于其他各人，几乎都和外国思想有些接触。有许多人更多多少少懂些外国语文。他们的变革思想可说大半由外国所启发。并且金强所研讨的这些改革家都出生在东南沿海诸省，容易和西洋及日本诸国文化思想接触。

我想特别在这里指出一件值得大家注意的事：自从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月刊上发表那篇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

书》，提出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和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两个目标，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和新思潮运动的两大口号以来，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在中国思想界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这两个观念当然在现代中国早就有人提倡过了。不过把这两者连在一起来提倡，还是比较稀罕。试看金强此书在“变法论”中介绍基督教改革者黄乃裳时，就说他于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回到福建的次年，即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适逢美国传教士蔚利高（The Rev. Myron C. Wlicox）的《大美国史略》中译本出版，约黄写序，黄在序中就指出：美国政教“以民主与格致为本”。当时所谓“格致”，后来都译作“科学”。黄乃裳那时正提倡美国可做中国变革的典范，可见他在中国提倡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并进，比陈独秀还早上20年。当然，比黄更早的例子也可能还找得到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种早期的说法，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。只有到五四时期《新青年》编辑们大胆提倡“德膜克拉西先生”和“赛因斯先生”时才哄动一时，产生长远的影响。

本书“革命论”的一篇讨论孙文的早期思想，即他的“农业改良言论”，王尔敏教授建议这个题目，我以为很有深意。一般人只注意孙是革命家，很少人重视他的改良言论。关于他的出身和家世，后人也往往随不同时代的需要任意渲染，金强就举出“雇农”、“贫农”或笼统说是“农民家庭”，罗香林教授则说是“耕读传家”，是否更近于事实呢？我把他称做“孙文”，绝无不敬之意。他在清末民初改革者和政治人物间当然是最有创见和深思的一位，可是也是后来制造过很大流弊的人。史家“临文不讳”，本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优良传统。如果对别的历史人物，除了自己相识的之外，都称名道姓，为什么单对一人就只能称字号和“先生”呢？“中山”本非他的字号，如果要称他的字号，就不如像西洋人称他做“孙逸仙医师”（Dr. Sun Yat-sen）。他早年为了避免清廷追捕，

逃亡日本，只好冒充日本人，化名“中山樵”，“中山”，本是日本人的姓，“樵”是日本人的名。后来被人误用中、日二姓称他做“孙中山”，本来有点不伦不类。他正式签名还是用“孙文”。可是后来政府竟把他的故乡“香山”也改成“中山县”了。我当然并不反对称他做“孙中山”，这样也可留些他早期亡命的纪念。我只觉得这名字不见得比“孙文”更多敬意或更正式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去年春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公开讲演过一次，也没有引起听众反驳。我现在再提出来，如果有人指出我的错误，我当然十分欢迎。

李金强教授这书只选了一部分改革家来讨论，现代“书生报国”的变革家自然还有很多。不过尝鼎一脔，他对每个主题都引用了许多新的资料，一定对后来进一步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。他这样脚踏实地，一点一滴累积地努力，也可做中国现代史家的榜样。我相信许多读者都可从这里得到不少启发。

周策纵

2001年2月5日，于美国加州
旧金山附近阿巴尼市之借水借山楼

自序

我国传统史学，于思想史研究，向以“学案式”体例为其代表，此亦晚近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，注重人物之由来，其中尤以1935年郭湛波出版《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》一书，被视为中国近代人物思想史的开山作；至60年代末，王师尔敏出版《晚清政治思想史论》，起而倡导治中国近代思想史，宜从时代创新概念进行研究与分析，并借此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“蓝图”。及至80年代国内史学界重视社会思潮课题的研究，与此如出一辙。

事实上，人物思想与思潮动向的研究，实为思想史中的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，宜相互观照、整合、求其合则两美。故本书虽以人物为中心，然所关注者，均为思想家因应时代变动而提出的创新思念，由此入手探索，谋求“旧瓶新酒”，为近代人物思想研究别开新面，包括林则徐“海防论”的由来，王韬的从教，何启、胡礼垣的“自由民权说”、“重商思想”及“中学、西学论”，胡礼垣对百日维新的观察，黄乃裳的“变法论”，严复及清季官绅的“海权论”，以及孙中山革命思想中的“农业改良言论”等。

至于书中结集的论文，除〈孙中山之早期思想——农业改良言论探讨（1887～1895）〉为年青时之撰著外，余皆成于1997至1999年间，时值香港回归祖国，而殖民地体制与社会始行变更以求调适，本港民间社会，处此“变局”，议论尤多，颇多感触。英国名史家卡耳（E. H. Carr）曾谓史学研究乃“现在”和“过去”之间无休止的对话，时亲历香港之“处士横议”，于撰写本书诸文时，又需回眸20世纪前后的中国时论，对于卡耳之言，倍感亲切。

而书中所附录之二文，均为论述当代港、台华文史学研究之动向，有助了解两地史学研究工作者治史之所本，故附录于此，以飨读者。

又本书之缘起，乃始于王师尔敏鼓励研究清季“变局”思想；及至入读新亚研究所，受教于王师德昭，始对中国近代思想人物

具有系统的认知；并从徐师复观之言教、身教，得以体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于新旧时代交替中，对于本国文化及传统儒家思想的持守与更新之愿景，此亦“书生报国”于学术文化的最佳写照。由是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一途，始具学力与感悟，而最终得以投身研究。

至于书中各篇论文得以相继完成，皆由两岸三地的教育、学术及出版机构邀约撰文而起，并由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基金(Faculty Research Grant)提供部分研究的资助；而本书得以出版，则有赖于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黄新宪兄之协助，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(University of Wisconsin)周策纵教授于抱恙之际，仍为本书撰写序言，尤为感铭，于此均致衷心之谢意。

余之立志治史而得渐窥史学之殿堂，乃其初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，受教于朱师际镗，际镗师讲论国史，不但力求推明大道，纲纪天人；且对民族文化精博之阐释，尤为发人深省；而最难得者，视学生如子侄，关顾有加。每当回忆从游于际镗师之时光，其中师生相会，谈论史学与世局于港式茶楼中，如在昨日。故谨以此书纪念际镗师。

李金强

2001年3月18日于香江天乐园

海 防 论



林则徐 像

林则徐与海防建设

——以虎门要塞为个案之考查

林则徐(1785~1850)为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(1796~1850)之名宦,与陶澍齐名,被认为是当时两位最具才能的封疆大吏。^①19世纪30年代末,林氏由于力主禁烟,触发中英鸦片战争(1839~1842)之爆发,其间于交涉、筹防、御敌、规划各方面,表现突出,遂被后世史家誉为近代中国史上之爱国杰出人物。^②

海防先驱林则徐

林氏原籍福建侯官,早年出身于倡明理学,崇尚实学著称之福州鳌峰书院,故已具经世致用之思想。^③1804年中举,随即于1806年至厦门出任海防同知房永清之书记,遂得以濡染海洋知

① 刘广京:(序),魏秀梅:《陶澍在江南》(台北: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1985年)。

② 戴学稷:《林则徐》,《鸦片战争人物传》(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1985年),1页;陈胜彝:《论林则徐的历史地位》,《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》(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0年),9~27页;1929年国民政府于虎门建立林则徐纪念馆,并订6月3日为全国之禁烟节,参Arthur W. Hummel: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* (1644~1912) (Washington: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, 1943), p. 514.

③ 鳌峰书院,参《闽侯县志》(1933年)(台北:成文出版社,1966年,重印本),95页,又该院于全国及福建之学术地位,参Suzanne Wilson Barnett, "Foochow's Academies: Public Ordering and Expanding Edu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", 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,16期(1987年),519~521页。

识，继而成为福建巡抚张师诚之幕僚，得悉兵、刑诸政，又参与镇压海盗蔡牵之“筹海”工作，由是得悉海防。^① 1811年，考取进士，随即成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至1820年，外调浙江杭嘉湖道，政声渐显，累官升迁至布、按两司以至督、抚方面大员，于地方上兵、刑、河、漕、农田、水利、赈灾、吏治，多所兴革，由是成为清中叶地方上干练之大员，深受道光帝之赏识，谓其“品学俱优，办事细心可靠”。^② 至1837年于湖广总督任内，鉴于鸦片流毒天下，遗害国家，遂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（1793~1853）严禁鸦片之倡议，力言鸦片为害甚巨，此祸不除“……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……”。^③ 此一针砭烟患时弊的论断，遂成为清中叶禁烟时代之名言，由是感动道光，遂于1839年授命林氏为钦差大臣，南下广东禁烟，从而启动林氏进行中英交涉，以至引发鸦片战争之历史巨变。其间林氏为求贯彻禁烟，对抗英国海军之挑衅与入侵，积极从事海防建设，揭开近代中国海防与洋务运动之序幕。综观林氏于鸦片战争时期之海防建设表现，深受时人推重，此即中兴名臣左宗棠所言：“迄今数十年，谈海防者必推公”^④；直至晚近，林氏“师夷长技”之海防建设及贡献，仍受史家交相称誉而未间断，故本文即就此探索林氏于广东时期筹建海防抗英之活动，借此说明林氏在近代中国海防

① 来新夏：《林则徐年谱新编》（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57~63页，关于林氏的海洋知识，可参杨国桢：《林则徐的海洋观与香港》（香港历史博物馆主办：“林则徐、鸦片战争与香港”研讨会，1998年），未刊稿。

② 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38册，11489~11491页；Hsin-Pao Chang: *Commission Lin and The Opium War* 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4), pp. 120~160. 萧忠生：《林则徐》，《福州历史人物》（福州，1988年），第一辑，32~50页。

③ 《林则徐奏片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鸦片战争》（上海：神州国光社，1954年），二册，142页。

④ 左宗棠：《叙》，《林文忠公政书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万有文库本），1页。

思想及建设运动中先驱的角色。^①

广州海防建设——炮台式要塞

1839年3月10日，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兼节制粤省水师，驰驿抵达广州，查办“海口事件”，负责禁烟事宜；随即推动一连串禁烟工作，包括向外商要求缴烟，缉拿烟贩，勒令外商出具不再夹带鸦片之甘结，以至虎门毁烟等，终于引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（Charles Elliot，1801～1875）的对抗。同年7月，发生尖沙咀村民林维喜被英水手酗酒杀害一案，牵涉两国司法主权纠纷，双方龃龉益深，最终演变成为中英两国武力之冲突，并爆发战争。^②其间林氏早已注意广州防务，整军备战，对于广东海防建设，尤为关注。根据时人魏源（1794～1857）之观察，谓林氏在粤进行之建设，包括刺探西事，招募水勇，整顿虎门要塞，购买洋船“甘米力治号”（Cambridge）及洋炮，加强水师训练，操演夜袭、

① Gideon Chen; Lin Tse-Hsi: *Pioneer Promoter of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Means of Maritime Defense in China* (New York: Paragon Book Gallery, 1961), pp. 6～23; 并参戚其章：《晚清海军兴衰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1～5页；21～32页。

② 林则徐：《钦差使粤任内折》，《林则徐集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），奏稿，中册，625～626页；武靖干：《鸦片战争史》（1928年）（台北：九思出版社，重印，1978年），41～65页。茅海建认为中英发生冲突，尤以林维喜一案交凶对抗为最，见茅海建：《天朝的崩溃——鸦片战争再研究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5年），126～127页；又林维喜案的交涉，参林启彦、林锦源：《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2期（2000年），97～113页。

火攻战法,借以对抗英人之入侵。^①其中林氏刺探西事、购买船炮,以及招募水勇协防作战,最受史家所重视;前者使林氏被誉为中国海防近代化之先驱,^②后者则被称为在依靠民众对抗外敌进行持久战,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,^③从而肯定林氏于广东禁烟时期海防建设之贡献。

然而,林氏使粤、督粤期间抗英军事思想与措施,主要仍以传统“消极防御”的海防战术思想为主导,此即林氏所谓:“以守为战,以逸待劳”,强调不在远洋与敌接仗,而于近海、内河或陆地进行歼敌作战为主;^④故此“首重周防……武备尤期整肃”。^⑤而林氏在粤之海防思想及其建设之重心,莫过于虎门要塞之整顿与布防,此即本文以此为研究个案之原因。

清朝自嘉、道以降,国势中衰,其时沿海海盗活跃,兼且广州一口通商之贸易限制,导致中外交涉与冲突频生;而沿海绿营水师,由于疏于训练,军纪废弛,炮台陈旧,炮质极差,故沿海

① 魏源:《道光洋艘征抚记上》,赵丽霞选注:《默觚—魏源集》(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94年),237页。魏氏谓林则徐至粤后“日日使人刺探西事,翻译西书……招募丁壮八千,……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排,横亘中流,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,增排两岸。……备战船六十。又备火舟二十,小舟百余,以备攻剿,并购旧洋船为式,使兵士演习攻首尾,跃中舱之法,使务乘晦潮,据上风,为万全必胜计。”并参梁廷楠:《夷氛闻纪》(1853年)(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重印本),41~42页;又参张墨、程嘉禾:《中国近代海军史略》(北京:海军出版社,1989年),11~14页。

② Gideon Chen, op. cit., pp. 6~23页,并参杨国桢:《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》,《林则徐论考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9年),23~35页;林永侯:《论林则徐组织的译译工作》,《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5年),118~137页。

③ 关于林则徐招募沿海渔、枭、蛋户等组成水勇抗英的论述以及其战术意义,可参田中正美:《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》,《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9年),240~245页。

④ 张一文、施渡桥:《试论林则徐的军事思想》,《林则徐研究论文集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2年),95~97页。传统中国海防战术思想的内容,可参Bruce Swanson: *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: A History of Chinese Quest for Seapower* (Annapolis: Naval Institute Press, 1982), pp. 55~56。

⑤ 《会阅虎门秋操折》,《林则徐集》,奏稿,中册,691页。

武力日趋衰弱腐朽。^① 随着西方以英国为首，挟工业革命武装海、陆强兵对华入侵，引致嘉庆年间清廷开始关注沿海沿江的防务，逐渐采用“炮台式要塞”之海防措施，借此强化海口防御力量。所谓“炮台式要塞”，乃“由若干按地形配置的炮台组成”，主要在海口战术有利地点，修筑一系列疏散分布、具有独立作战，以及能长期坚守之炮台，并透过各种防御工事及火炮配置，提供守备以及密集交叉火力，互相支援，借此打击入侵外敌，从而达到保土卫国之战略目的。广东亦不例外，先后在珠江口一带修筑炮台，其中以虎门要塞的修成，最为重要，并成为全国“炮台式要塞”的典范。^② 1834年关天培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后，对于虎门要塞各炮台的经营与规划，更是不遗余力，规模日臻完善；^③ 及至林则徐抵粤后，即在此一海防理念下，于关氏建设虎门要塞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整顿，从而达成“海疆重地，武备宜严”，使粤海海口防务达到更加强化的要求。

鸦片战争前之虎门要塞

虎门位于省会广州东南60公里，为珠江流域出海地带，其范围包括北起内河狮子洋至南面外海伶仃洋一段长约8公里之珠江河面；河之两岸，群山林立，中间小岛罗列，形势险要，由于地

① 海军司令部：《近代中国海军》（北京：海潮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32—41页，并参王家俭：《清代的绿营水师》，李金强等编：《近代中国海防—军事与经济》（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，1999年），209—212页。

② 《中国军事史》（北京：解放军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第六卷，兵垒，331—335页；据外人考察，广东的炮台乃以花岗石块砌成，炮台后方靠在一个陡峭的山岗，形状像“马蹄式”，主要仿效自葡萄牙人在澳门所建之炮台，参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：《鸦片战争史料选译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，68—69页。

③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：《鸦片战争史料选译》，同前注，68页，谓1834年后虎门的炮台“……已显得像个正规炮台……”。

近海口，故于清代被称为“粤海中路咽喉”，成为保卫省会之前哨，自具战略地位。^①

自外海伶仃洋过龙穴，北航首见沙角、大角两山斜峙，北进5.5公里，即见横档岛屹立中央，其稍前为礁石饭萝排，再前为小岛下横档，航道至此一分为二而成东西二支：西支航道位于横档岛与芦湾山之间，“多有暗沙”，不宜航行；东支航道，位于横档岛与南山（又称武山）之间，“山前水深，洋船出入皆由于此”。由横档向北航约2.5公里，则为大虎山及其西边之小虎山，南控狮子洋，为由黄埔以进省之路，由此观之，虎门实为“重重门户，……险要天成”，此即其得以成为海口要塞之地理因素。^②（参附图1）

虎门一地，自清初开国以来，由于其地险要，基于海防因素，已经陆续修建炮台，不断增加防御设施，渐成华南海口重要“炮台式要塞”，而其军事作用主要在于“设立重兵，内护省城，外捕奸匪，缉盗防夷，与香山为犄角”。^③虎门要塞此一海口防御体系，历经康熙至嘉、道年间150余年之修建，始告完成，其进展主要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。

（一）创始阶段（1717～1834年）

自清初开国后，于虎门两岸之山屿，相继修筑炮台，而以嘉、道年间之修建最多。1717年，首先于横档及南山两岛分别修建炮台，其中南山炮台，位于南山脚下，面对西南，炮台周围52.5丈，置大小铁炮12门；1801年于海口东面之沙角添设炮台，位置西

① 茅海建：《天朝的崩溃—鸦片战争再研究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5年），219页。

② 林则徐：〈查察虎门炮台折〉，《林则徐集》，奏稿，中册，641～642页；《中国军事史》，同前注，337页；本段引文均见于〈查察虎门炮台折〉。

③ 关天培：〈虎门筹议增改章程咨稿〉，《筹海初集》（1836年）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8年，重印本），一册，83页。

向，炮台周围 42 丈，置大小铁炮 12 门；1807 年，又于南山炮台之北，修建镇远炮台，面对西南，炮台周围 120 丈，置大小铁炮 40 门；1810 年于西面新涌设炮台，位置南向，炮台周围 42.5 丈，置炮 12 门；1812 年，于黄角山根置建蕉门炮台，位置向东，炮台周围 42.5 丈，置炮 14 门；1815 年，由于横档炮台稍狭，加建“月台”^①一座，正面朝北向，炮台周围 91 丈，置大小铁炮 40 门；1818 年，又于大虎山设炮台，面对东北，炮台周围 120 丈，置大小铁炮 32 门；1832 年于海口西南大角山添设炮台，位置东向，炮台周围 93 丈，置铁炮 16 门。至此虎门共设炮台九座，^②其中沙角、大角、南山、镇远、横档、大虎为商、夷进省必经之路，此即东支航道所在；而蕉门、新涌则为商、渔出入捷径，此即西支航道所在。至于南山、镇远、横档、大虎四座“形势联接，炮火得力，尤为防范夷船第一要隘”，^③最为重要。（参附图 2）

（二）确立阶段（1834～1838 年）

主要由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（1781～1841）主其事，对虎门要塞大加整顿。其原因为 1832 年曾有海盗入口，攻占黄埔附近的“浩官炮台”，1834 年律劳卑（Lord Napier）出任商务监督，派英舰“安德罗马奇”（Andromache）号及“伊莫金”（Imogene）号二艘乘潮闯入珠江口，直达黄埔停泊，而要塞岸炮，水师均未能

① 所谓“月台”乃指修建于山脚下，呈弧状之炮座，高出水面约 1～2 米，就此发炮，射击弹道低伸，没有死角，故能有效地控制水面，参《中国军事史》，第六卷，兵垒，334 页。

② 此一阶段修筑各炮台之情况，可参关天培：《重勘虎门炮台筹议节略稿》，《筹海初篇》，一册，99～116 页，并参杜永慎：《对虎门炮台抗英大炮和虎门海口各炮台的初步考查》，《文物》，3 期（1963），49～50 页。

③ 关天培：《札饬勘加训练稿》，同前注，143 页。